

漫谈吕伯奢

□ 张素明

因为曹操,吕伯奢的名字流传了近两千年,而且随着《三国演义》之流传,吕伯奢的名字仍将继续流传下去。然而也正是因为吕伯奢,陈宫才对曹操有了此乃“狼心之徒”的看法,并欲杀之而除后患。九口人成了一番热情的殉葬,怎不让人脚底抽凉心中泣血。很多学者认为吕伯奢是《三国演义》中的虚构人物,其故事在《三国志》中并无确切记载,大部分人对他的了解源于《三国演义》他一家人被曹操杀戮的小说描写。那么如何看待这一人物及其相关事件呢。

《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这样描述:

行三日,至成皋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处谓宫曰:“此间有一人姓吕,名伯奢,是吾父结义弟兄;就往问家中消息,觅一宿,如何?”宫曰:“最好。”二人至庄前下马,入见伯奢。奢曰:我闻朝廷遍行文书,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陈留去了。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陈县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陈宫曰:“小侄若非使君,曹氏灭门矣。使君宽怀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说罢,即起身入内。良久乃出,谓陈宫曰:“老夫家无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来相待。”言讫,匆匆入内而去。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吕奢驴鞍前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吩咐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彻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这一情节描写旨在刻画曹操的多疑、狠辣,强化其“奸雄”形象。符合《三国演义》扬汉贬曹之宗旨。虽然正史《三国志》无吕伯奢相关记载,但《世语》《魏氏春秋》《孙盛杂记》以及《太平御览》所引的《魏书》等史料记载,中平六年(189年),曹操逃离董卓返回乡里,途中经过成皋,曾借宿于吕伯奢家。而对曹操诛杀吕伯奢全家并未有任何记载,是一些民间传说对曹操的负面刻画以及后世其它文学作品对曹操的负面演绎可能被罗贯中用在《三国演义》创作中,进而形成对曹操的不良影响。

曹操的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道德观和历史文学作品的张力。吕伯奢事件成为曹操“不义”的象征,凸显其功利

主义与道德争议,与刘备的“仁德”形成鲜明对比。复杂人性刻画是每一部文学作品有无深度,能否深入人心的重要内容。《三国演义》第四回这一情节描述,反映了乱世中生存的残酷性。曹操的猜疑某种程度上是政治逃亡中的自保本能,也是曹操极端性格导致极端手段的最好表达。小说尊刘贬曹的立场导致曹操形象被刻意负面化,吕伯奢事件是典型例证。它体现了《三国演义》的倾向性,这与正史中的曹操杰出政治家兼具雄才大略与权谋手段的描述大相径庭。也正是由于这种极端的表达方式使吕伯奢的故事通过小说、戏曲、评书等传播,固化了曹操的“反派”形象,成为大众文化中“恩将仇报”的代名词。这不得不让我们从现代视角进行反思,即历史人物具有多面性。若回归历史,曹操的成就(统一北方、改革政策)需客观评价,但文学中的道德污点(如吕伯奢事件)仍影响其历史声誉。

吕伯奢事件有可能是一个虚构故事,却成功引发人们对权力、道德与人性的思考,成为《三国演义》中探讨“乱世生存伦理”的重要符号。吕伯奢的故事本质是文学创作对历史人物的再诠释,其核心价值在于揭示人性的复杂性与乱世中的道德困境,从而以引起人们对权力、忠诚与背叛的深刻思考。

当时,假如吕伯奢不允二人入庄,抑或是不去沽酒杀猪,甚而至于驱之庄外以报官相胁,何来举家九口肝脑涂地命赴黄泉。再退一步而言,就算入得庄来,当时家中有甚吃甚,草舍茅房安顿一宿,不也对于戴罪逃难之人完全说得过去。细细想来人性使然,无以救药。

由此,乱世之中人性拷问、道德标准崩塌以及权力逻辑的残酷,似乎对于当今社会做人做事仍有深刻隐喻。为此我们不妨展开作一些解析。

在逃亡绝境中,曹操的“多疑”本质是乱世生存本能的极端化。他对吕伯奢一家的屠杀,折射出权力斗争对人性的扭曲——当生命处于绝对威胁下,信任成为一种奢侈品。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并非单纯的个人恶行,而是权力游戏中“黑暗森林法则”的缩影,先下手为强的逻辑取代了人性中的同理心,这一点似乎现在官场商战也并不少见。

吕伯奢的热情款待,象征传统社会“仁义”价值观的延续,但其善意在乱世中成为致命弱点。好酒好肉换不来有些人人性的残酷,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暗示了道德理想主义在权力丛林中的脆弱。这一情节揭示了人性中善与恶的对抗,当暴力成为生存法则时,善意可能反成灾祸。

曹操的行为彻底践踏了儒家伦理的“忠恕之道”即“能近取譬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是积极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则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曹操在处理吕伯奢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以一己之

臆想推断吕伯奢,并对其全家大开杀戒,显然没有一点人性,也毫无人伦可言。罗贯中通过这一事件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在乱世中,是否存在普适的道德准则?曹操以“自保”为名合理化屠杀,实质是将道德相对主义推向极端,也就是说为了自我的生存,一切手段皆可正当化。

若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权利逻辑审视,曹操的冷酷或许被视为政治家的“必要之恶”。但从绝对道德视角看,这无疑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吕伯奢事件的核心矛盾在于,追求宏大目标(如统一天下)是否能为践踏个体生命(如灭门惨案)提供道德豁免?这一问题至今仍是政治伦理的经典困境。

曹操的杀戮行为本质是暴力对道德的宣示。通过消灭潜在威胁(哪怕只是臆想中的),他宣示了权力逻辑的核心——控制与支配优先于伦理判断。吕伯奢一家的悲剧证明,在权力争夺中,普通人往往沦为“代价”,而非被考量的对象。

曹操事后对陈宫的辩白“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实则是为权力者的暴力建构合法性。将自私的生存策略包装为“现实主义智慧”。这种逻辑在历史上反复重现,成为统治者合理化暴行的常见话术。

吕伯奢作为乡绅代表,本属地方权威,但在曹操这样的政治野心家面前,其社会地位毫无意义。这种对比凸显了权力结构中的绝对不对等,个体道德在系统性暴力面前不堪一击。

曹吕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朋友之间的友谊,吕伯奢面对的是当时的犯罪之人,容留他们很可能给自己带来祸患,但吕伯奢并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也没有做任何厉害权衡,而是非常热情地招待,过度的热情显然让曹操产生了巨大误会,加之没有任何依据的主观臆断,更加深了他的疑心,进而杀心顿起。按曹操的逻辑不是你的生存就是我的生存,那么只能选择我的生存。在此罗贯中通过这一事件,展现了3个残酷真相:即人性之恶在权力真空下会被无限放大;道德在生存危机前可能沦为装饰品;权力的扩张必然伴随对弱者的吞噬。于是杀罢吕家八口后,曹操又对可能存有一线生机的吕伯奢举起了屠刀。

一万个人看《三国演义》会有一万个人记得住曹孟德的那句名言,但一万个人看《三国演义》未必都能记得吕伯奢。孟德之流古今有之,伯奢之流亦然。在当今高度竞争的社会中,权力博弈、道德困境与信任危机普遍存在。要跳出“曹操式”的生存逻辑藩篱,我以为既需要个人觉醒、制度约束还需要文化重塑,也许三个维度切入,可能成为保护自我又不失底线的生存策略。只是千万甬像费翔那首歌唱得那样:“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的沙漠。”火不可以没有,但真正燃烧起了整个的沙漠,就不会不有纵火之嫌疑,最终很可能连自己也被葬生火海。

炽热的旋律

□ 吴昆

大暑的阳光,如激昂的音符
跳跃在滚烫的大地之上
奏响一曲炽热的旋律

蝉鸣是高音的嘹亮
蛙声是低音的和鸣
荷叶田田
是旋律中的舒缓篇章

汗水是拼搏的节拍
劳作的身影,是坚韧的音符
在田埂、在工厂
在梦想的路上

那热烈的风,是激昂鼓点
催赶着时光的脚步
让生命在炽热中绽放光芒

炽热的旋律,没有终章
我们的勇气和爱
永远高昂

大暑的气场

□ 魏益君

热浪翻滚,是夏日
独有的交响,空气凝滞
满载着生命的张狂。这
便是大暑无可抵挡的气场

阳光如瀑,毫不吝啬地
将金辉洒满大地
翠绿的叶子,娇艳的花朵
在大暑的气场里
显露着生命绚烂

夜幕降临,星辰点缀着
夜的空旷,但大暑的气息
依旧在夜风中荡漾

大暑的气场
是热烈与生命的交响
是夏日的华章与辉煌
在夏的尾声里,尽情释放
季节的光芒